

淮北新四军第四师老战士

回忆录

——来自地下战场的报告



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准印

淮北新四军第四师老战士

回忆录

第二卷

——来自地下战场的报告



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准印

(粤) 准印字第 1046 号

作 者 许天民
总 编 刘 刚
封面设计 蒲广寒
封底摄影 张爱萍
校 对 黄劲松

回忆录/来自地下战场的报告/

淮北新四军第四师老战士编审联络组编

I. 回... I. 许天民 III. 淮北斗争史料

准印出版：广东省新闻出版局

印 刷：广东省委党校印刷厂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

14 印张

256 千字

1997 年 7 月 1 日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—6500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定价：(平) 20 元
(精) 25 元

淮北四师老同志：

现有安徽省蚌埠市郊燕山乡徐桥村王桂江寻找父亲王凯同志下落，一九三八年在书案店参加新四军游支队随营学校。

王凯同志原名王汝英，别名王少安，入伍时改名王凯。本人系安徽省蚌埠市郊（原凤阳县）徐桥人，1938 在蚌埠第二师范学校读书，在校参加读书会，受到进步思想影响，与王一平同学（现南京空军干休所）参加了第五战区黄川青年军团，后觉不对头，与王一平、谢广禧、程光纯等四人携手枪一支出逃，途中遇彭雪枫部队，在河南永城书案店参加新四军游支队随营学校学习。三、四个月，王凯被分配在老二团，（即后十一旅三十二团）任连队文化教员。1939 年王一平调津浦路东工作，王凯仍在路西工作，从此他二人失去联系了。

他们查《新四军第四师淮北军区连以上干部编制序列》一书，201 页中之王凯，是在卫生休养所作医护工作，据说不是王桂江之父亲。而王桂江曾多次上访查寻，均无下落，生死不明。王桂江也多次来信查寻其父。现借此发书之机，如知之者以告之。六十年的变迁，而王凯是幸存？是牺牲？是复员转业？甚至是被捕被俘？还是……。如有个下落，以慰其家属。子女们向组织上也好好有个交待。

致 此

礼

刘 刚

蒲广寒

1997 年 8 月 1 日

如知者可告其本人王桂江，

地址：安徽省蚌埠市郊燕山乡 徐桥村

邮编：233040

淮北新四军第四师老战士回忆录

编审联络组

名誉顾问：

张爱萍 张 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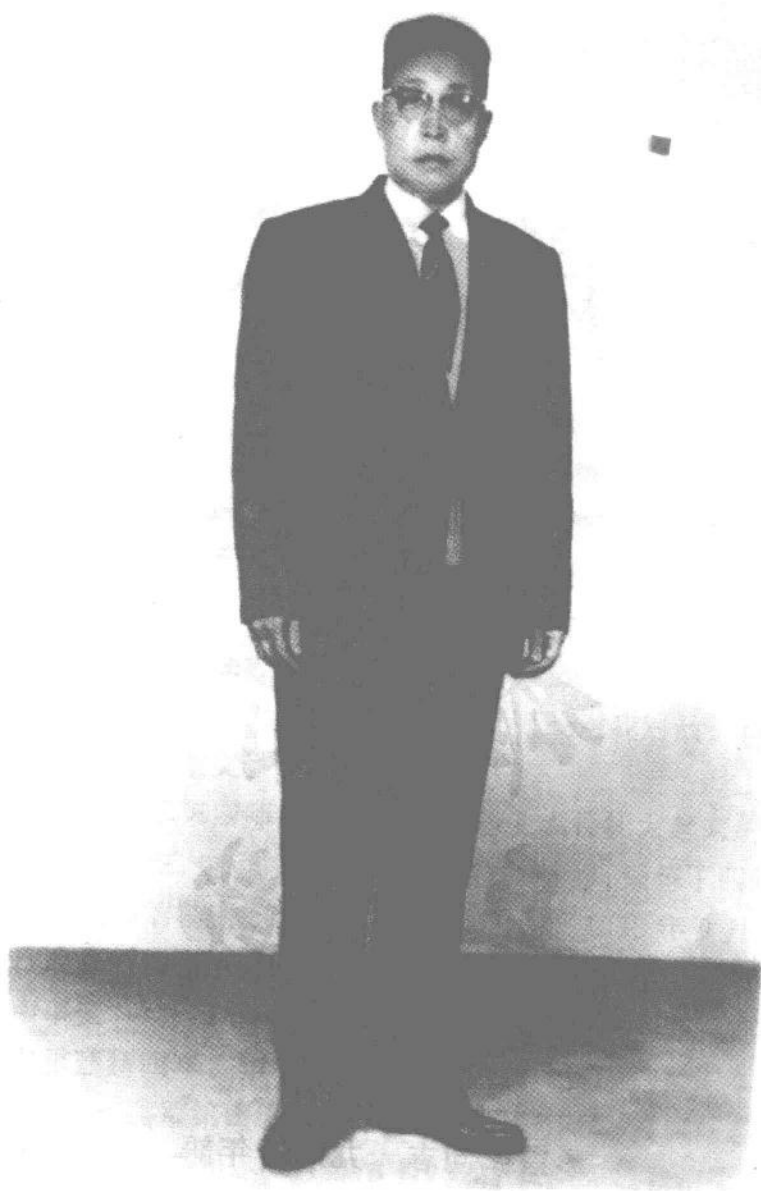
编审常务联络员：

刘 刚(负责人)	丁希凌
干思贤 王 磊	叶 英
张闻智 郭一萍	袁平文
葛静波	

——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70周年



“八一”军旗迎风展，
五星红旗飘蓝天，
兵强马壮山河好，
伟大祖国万万年！



1959 年 2 月摄于香港

手無寸鐵
腹有雄兵

彭雪楓同志一九四一年語

序

淮北抗日民主根据地，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领导的全国 19 个解放区之一，位于豫皖苏鲁四省交界地区。北与冀鲁豫和山东根据地接壤，是华北八路军与华中新四军的联系枢纽；东与苏北和苏中抗日根据地毗连，是该抗日根据地的西部屏障；南与淮南抗日根据地相接，是华中新四军东进苏北、西连中原的前进阵地。它处于日寇占据的徐州、蚌埠、淮阴三大军事重镇之间，是国民党顽固派东进北上的必经之路。因此，不论对我对敌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。

新四军第四师就是在这块土地上成长壮大起来的一支抗日劲旅。也可以说这块土地哺育、培养、锻炼了四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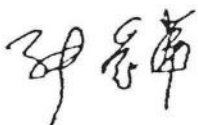
四师的前身是彭雪枫同志领导的于 1938 年 9 月 29 日成立的新四军游击支队，后改为八路军第四纵队。“皖南事变”，新四军遭到严重破坏。党中央、毛泽东同志决定重建新四军。华中各根据地部队统一整编为新四军七个师。八路军第四纵队改编为新四军第四师，雪枫同志任师长兼政治委员。1941 年 8 月，邓子恢同志任政治委员。1944 年 9 月，雪枫同志不幸在战斗中壮烈牺牲，我受命任

师长。

在八年抗日战争中，受到淮北人民热爱的新四军第四师，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，以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百倍仇恨，杀日寇，除汉奸，驱顽军，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疯狂进攻、“扫荡”，收复了被强盗盘踞的一块块土地，表现出了忠于祖国、压倒一切敌人的恢宏气魄和舍死忘生、前赴后继的革命精神，创造了惊天地、泣鬼神的英雄业绩。四师指战员在这块土地上抗击和牵制了十余万日寇，阻止了国民党顽军东进反共的罪恶行径，为坚持抗战、保卫华中、解放我中华民族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。

《抗战在淮北》是四师部分同志亲身经历的汇集，它体现了四师的战斗历程。真实可信，丰富翔实，亲切耐读，是进行传统教育、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，而在此时出版，又是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的献礼！她将告诫人民莫忘历史，珍惜胜利，保卫祖国，保卫和平。

组织编写、出版此书的同志们，付出了大量的辛勤劳动。藉此向他们祝贺和感谢！

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, appearing to read '史向东' (Shi Xiangsheng).

引 言

我写这个回忆录，从 1984 年离休后就考虑了。自从参加革命后，可以说，做了一辈子情报工作。在党的领导下，我只身被派入敌区，与日、伪、顽打交道，从一个人发展为新四军四师党委领导下的“特别支部”，先后发展了几十名同志战斗在无形战线上。有些同志钻的很深，打入敌要害部门，取得了关键时刻的关键情报，为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做出了应有的贡献。有的同志为党的情报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。他们牺牲得光荣壮烈，是我们情报战线上的勇士、楷模，永远值得我们纪念！为此，我想把“特支”这个组织及其成员所做的工作，做一个忠实的纪录，希望从中得出某些经验教训，“鉴往而知来”。

无形战线的斗争，是极其复杂、尖锐、激烈的战斗，党号召我们，要甘作无名英雄，我们许多同志都这样做了。但我认为，“赏莫重于间”这一名言也不可忽视。一个地下情报工作者，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做出过重大贡献，毛主席曾经说过：将来发勋章首先要发给他们。陈毅同志在指示我们的工作时说：“这些同志现在看起来是一个人，他的作用到一定时候比我们好多人作用大。”

又说：“一个干部，一个党员，一个同志，他们在敌人那里做件事情，一旦做出来，就比我们多少军队做的都重要。他能起到我们多少军队起不到的作用。”这就是“非圣智不能用间”之道。

我认为，在情报战线历史上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同志，出生入死，默默无闻，领导上应给予精神上、物质上的奖励。这不仅是对一个同志个人的安慰，更重要的是着眼于未来。“凌烟阁上的功臣”是绘给后人看的。如果一个情报战士过去做出过很大贡献，而至死仍是无名英雄，会给后来人留下什么印象呢？据我所知，任何国家对情报工作者都是异常重视精神与物质鼓励的，我们国家的军队、公安战线也是这样做的。

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革命历史阶段，我们的“特别支部”和“徐州工委”，一直是潜伏在敌人内部的地下组织。这两个组织本是一体的，因为抗战胜利，解放战争开始，工作中心转移，地区变动而改为两个名称。他的组织成员基本上是在敌军的内部发展和成长的。其所以能在两个革命历史阶段取得了大量的军事战略情报、重要机密资料，及时配合我华东、华中、中原、华北、东北等各个战场和大军渡江南下的需要，主要是有党的坚强领导和各个大区根据地的负责同志的关怀重视，及时指示，并有一群忠于革命事业，不避艰险，不怕牺牲，排除重重困难，忍受一切痛苦，有胆有识，智勇兼备的优秀分

子忘我奋斗而得来的。

他们打入敌内，在敌人高级领导和高级指挥机关的要害部位深入潜伏，掌握和接触着敌人核心机密。如朱建国先后任第十一战区长官部少校作战参谋、代作战科长和该战区天津指挥所主任参谋。王嘯在第十二战区长官部任上校参谋。石淳在第十一战区长官部任少校情报参谋，周启祥任第十一战区长官部机要秘书。唐复华在济南第二绥靖区司令部任上尉参谋。赵炜在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任少校作战参谋。蔡云培在鲁苏皖豫边区党政分会任中校编辑。宁延惠任临泉军统局特务机关少尉录事。王奇与刘东海任第三十一集团军上校参议。黄铸臣任河南省政府荐任秘书。孟庆元任第九十七军中校党工队长。李村汀任第三十八军特别党部上校秘书。周郁文先后任第五十一军上尉副官。任正远先后任第十二军参谋处少尉书记、第六十八军上尉指导员。王凌霄任新七军上校旅长。王志远任第五十五军中将副军长。朱晦生先后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的少、中校随从秘书。高宜之任上校团长。张遵达任少校营长。李紫明、田瑞珍、崔景元、张振甲任上尉干事或书记等等。他们不仅可以随时搜集军事情报，而且一些作战计划，各种上报下达的机密文件的草拟，多是出于他们之手。

他们活动地区分布很广，且大都接近战略要地，如江苏、安徽、山东、河南、陕西、四川、绥远、河北、辽宁

和上海、南京、北平、天津、徐州、开封、郑州、西安、重庆、济南、沈阳等二十余个省市。

他们独立活动，各自为战，但又不放过一切机会争取与所在地党组织取得组织联系。随着所在部军队行动，不论驻防何地，只要接近我解放区和根据地或我驻各大中城市办事处、联络站以及军调部等组织机构，他们都千方百计取上联系，提供情报，请示工作。曾经联系过的组织有：华东局、华中局、中原局、晋冀鲁豫中央局、鲁南区党委、江淮区党委、豫皖苏区党委、冀鲁豫区党委、鄂豫皖区党委、重庆八路军办事处、北平军调部、涡阳联络站等。

他们坚持长期打算，在敌区长期隐蔽。自抗日战争初期，到解放战争取得最后胜利，他们始终坚守岗位，坚定信念，严守纪律，确保秘密，不图名利，不计荣辱，不怕牺牲。

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完成任务，在秘密工作中发挥出高超的斗争艺术。在通讯联系方面，除北平与沈阳是以秘密电台分别与中央进行联系之外，其他地区均由专线秘密交通或“特支”、“工委”负责人以机智灵活、化装掩护，取得合法身份。或窃取证件，偷越禁区，进行联系。在战争紧急关头，为了争取时效，不误时机，甚至以充当俘虏的办法把情报送到我军前线指挥部，不用文字记录，默背记忆，不留任何痕迹。

但这毕竟是一场用间和反间的艰苦斗争，在这场看不见战火的拼搏中，我们也付出了重大牺牲。如朱晦生同志于1948年去豫皖苏区党委汇报工作，在返回途中被敌秘密杀害，尸骨无存。朱建国、石淳二同志在北平期间，因与他们毫无工作联系的秘密电台遭敌人破坏，从而搜到了他们转去的大量军事情报原件，受此株连而被逮捕，在敌人严刑讯问并出示证据之下坚决拒供，后被蒋介石解赴南京，遂与谢世炎、丁行、赵良璋等三位同志一起从容就义，被称为五烈士。毕彦升同志在周口工作积劳重病过早牺牲。甚至打入敌内的张大伦，被友邻地区错捕后，因弄不清真象，竟以其公开“特务”身份而误杀，成为“赏莫厚于间”的反义！

幸存者如何呢？他们的处境也十分坎坷。他们过去的活动形式独立分散，各自为战，单线联系，多头领导，工作无记录，贡献无存案。而旧政权覆灭，新中国建立之后，我们的原有组织、系统、人事、机构发生了极大变化，原来的领导机构已不存在，老的领导同志渐渐故去，新建立的人民共和国百废待兴，时过境迁往事无人问津，因此，不少同志又无处说，有冤无处诉，又被埋到地下了。这些同志在解放之后找不到自己的门牌，报不上自己的户口，没有自己的队列，没有自己的座位，成了断线风筝，被遗弃的无名孤儿。

在历次革命政治运动中，这些同志虽然内心清白，但

面目却十分“肮脏”，因为伪、奸、党、政、军、特各种掩护身份总是过不了政治历史关，知情者已不知所踪，原来的领导和联系人一部分早已作古，一部分不知下落，光荣的而又“肮脏”的历史一时无法得到证明还其清白，这样就难免蒙冤受屈，遭到各种冲击，不仅本人受到历史的扭曲，也累及了家属和后代。特别是王奇、张长青、刘东海、王凌霄、王治国等五同志竟因地下的“反动”历史，在“文革”中被“四人帮”迫害致死。

1984年，我离休后从各地寄来的外调材料中得知一些同志的处境，经过亲访询问，发现确有沉冤不白的历史问题。为此，遂向有关领导机关写出了报告，请求给予审查纠正，正本清源。但是由于报呈机关不对口，权责分不清，虽然三番五次申诉，均遭拒绝受理。眼看受冤的同志已七老八十，如再拖延时间，即要死无对证，冤情势必成为永久秘密。后在中央组织部提醒之下，才向党中央书记处写了报告，提供了这一情况。经中央书记处指示，国家安全部负责审查处理。至此，问题才有着落。

五年来，经国家安全部落实政策办公室艰苦细致的调查核实，许多问题得以水落石出。现在除了失踪或无线索查找者外，大部蒙冤同志得到了正确对待，问题已予合理解决。1990年10月21日，安全部落实办的工作行将结束，在密云水库安全部招待所召开了一次“苏鲁豫皖地区有关情侦人员落实政策汇报座谈会。”这次会议听取了朱

玉琳同志的报告：根据 1985 年中央十六号文件精神，经过六年的艰苦细致深入调查，弄清了大部分地下同志受到的不应有委屈和不公正的待遇，给予平反纠正，实事求是地落实了党的政策。会议中，老领导罗青长，中央组织部的杜铁同志所作的热情洋溢的长篇讲话，对我们过去的工作作了很高的评价，这对与会者是莫大的安慰和鼓舞。更为欣幸的是地下工作时期，处于秘密环境，大家虽在一个党支部领导下工作，在一个战壕里战斗，但是互无联系，各不相识，直到五十年后才有这一相聚机会，得以相见欢叙，这也是一大补偿。

道路尽管坎坷，光明毕竟展现在人们面前。几十年来，无论道路多么曲折，我们这些在看不见的战场上的同志们朋友们，始终像孺子牛一样，在无形战线上用生命谱写的这首如此宏阔感人的孺子牛奋蹄曲，将永垂青史。这首孺子牛奋蹄曲的主旋律，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崇高宗旨——为人民服务。这不同凡响的主旋律，无论是在看不见的战场上，还是在炮火连天的硝烟里，无论是在革命战争的艰苦岁月，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拼搏时期，一直是激励人们奋勇向前的进军号角。愿它永远在人们心田里传播、激荡，直到人类美好的遥远的未来。

我不是个长于写作的人，这些年来曾数易其稿，写得很艰辛，也深感力不从心。我是“特支”活着的唯一负责人，如不把这段历史写下来，内心永远不会平静，也就对